

QINGMOMINCHU
KONGJIAO YUNDONG YANJIU

清末民初 孔教运动研究

范玉秋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QINGMOMINCHU KONGJIAO YUNDONG YANJIU

清末民初孔教运动研究

范玉秋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民初孔教运动研究/范玉秋著.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

10

ISBN 7-81067-951-1

I. 清… II. 范… III. ①孔丘(前 551~前 479)—思想评价—中国—清后期 ②孔丘(前 551~前 479)—思想评价—中国—民国 IV.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313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网 址 <http://www2.ouc.edu.cn/cbs>

电子信箱 hdcbs@ouc.edu.cn

订购电话 0532-85902478(传真)

责任编辑 李建筑

电 话 0532-85902505

印 制 文登市印刷厂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4 mm×215 mm

印 张 8.5

字 数 227 千字

定 价 22.80 元

序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臧克家语）

孔子，2 500 多年前的历史人物，早已死了，但却依然活着，依然活得那样真实、那样亲切、那样鲜明，依然支配着乃至左右着不少人的生活，甚至影响着近代、现代中国的命运。

正因孔子还活着，围绕孔子的是非之争出现了。有的人愿他活着，于是就尊崇他；有的人恨他活着，于是就批判他。长期以来，尊崇他与批判他的人，两军对垒，不斗个你死我活不休兵。尊孔的人，指责反孔派是对民族的“精神自宫”，是“文化自残”，是文化的“自毁长城”；而批孔者视尊孔者为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是保守人物、落后分子、反革命阶级、复辟派。20 世纪 70 年代，尊孔与反孔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革命与反动的分水岭与试金石！

2 000 多年前，大史学家司马迁曾感叹：“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史记·孔子世家》）可谓一语成谶！2 000 多年来，多少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曾几何时，显赫无比，死后不久，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唯独孔子，传 2 500 余年，至今天下议之！

然而,当激情燃烧的岁月不再,重新检索近代以来的尊孔与反孔之争,不难发现,这是一场中西文化之争,孔子不过充当了中国文化的符号、象征、挡箭牌罢了。尊孔者之所尊,已不完全是2 000多年前那个在历史上曾出现过、生活过的孔子,而是以孔学为核心、2 000多年来所形成的那套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情感;反孔者之所反,同样不是2 000多年前在历史上真正出现过、生活着的孔子,而是以孔子为护符所形成的那套伦常纲纪,那些民族积习。围绕尊孔与反孔所发生之斗争,实质上是文化的主体主义与文化的替代主义之斗争。不难发现,尊孔者大都坚持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本位、主干、核心,通过吸收西方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有益因素,促进中国文化的新生;而反孔者大都以西方的某种宗教、主义、主张为主体、本位、核心,通过吸收中国文化的某些因素,促进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发展。一句话,是中国文化活转于现代,还是中绝中国文化的固有进程而代之以西方化在中国,这是尊孔与反孔的实质。

尊孔与反孔,一直与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纠缠在一起,与中国近代以来一场又一场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文化运动纠缠在一起,这种或纵或横,或重或轻的特殊关联交织成一幅色彩斑斓、浓淡相宜的历史山水画卷!亢奋的激情可以不再,尊孔与反孔的情绪化喧嚣可以暂时归隐,然而只要我们还处在走向现代化的征程中,只要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真正的伟大民族复兴、伟大华夏文化复兴,尊孔与反孔就会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

虽然,尊孔与反孔的历史尘埃远未最后落定,虽然许多问题只有经过历史进程的长期历练才能看得分明,但近代中国尊孔与反孔这一文化现象很值得研究,现在从事该课题的研究可谓恰逢其时。而尊孔与反孔的一大关节、大枢纽,孔教运动是也!近代以来,一切尊孔者起于是,一切反孔者,亦由是生。孔教运动发轫于1895~1898年间的维新变法运动,首倡者为康有为、谭嗣同诸人。

他们既是那个时代思想最为激进的群体，又是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鼻祖。维新运动归根到底是力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中国社会结构根本转型的近代化运动，孔教运动则是思想意识形态转型的体现，它既是维新运动的组成部分，又是维新运动的思想基础。作为维新运动的组成部分，它是以孔子思想为核心，通过借鉴西方基督教的组织方式、传教方式，促进孔学向近代转变的运动，是孔学的宗教化运动；作为维新运动的思想基础，它是近代的启蒙运动。

维新运动失败了，当然孔学通过自组织的调整实现近代转型并继续发挥自然国教作用的机遇也丧失了。民国以后，康有为、陈焕章等人一再努力，力图借助旧势力以实现“立孔教为国教”，在当时根本行不通！民国，说到底是革命的成果，而近代革命一直是西方宗教——基督教的胜场，从洪秀全革命到孙中山革命，都有浓厚的基督教背景！洪秀全革命的思想基础固然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变种——拜上帝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核心团队中基督徒占了相当的比例。而儒家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改良主义相关，从维新运动到梁漱溟的乡建运动，无不如此。可以说，改良主义是近代儒学的本性，而革命主义为基督教所钟情。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力图借助革命的成果实现改良主义的孔教理想，可谓痴人说梦！

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在民国初期立孔教为国教的活动，先是遭遇到基督徒徐谦、诚静怡等“信教自由会”者发难，继之受到醉心于西化的人士——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全面围攻，非但没能实现立孔教为国教的目的，反而累及孔子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声势浩大的批孔讨儒运动由之而兴。

孔教运动源自维新，盛于民初，延续至今，起源于中国，远播海外，至今尚存。展开此项研究工作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范玉秋同志自1994年起在山东大学哲学系学习、研究，1998年起，攻读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论文题

目就是“康有为与孔教运动研究”，2001年继续攻读该专业的博士学位，锁定孔教运动作为研究目标。2004年博士毕业，居东海之滨，继续从事该问题的研究，屈指数来，已十余年矣！十年磨一剑，玉秋同志这部学术论著是也！至于这一剑的成败利钝，最好读者自己去评价吧。

与玉秋同志交往有年矣，彼此相知甚深。在我的名义下，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于是有了暂时的师生名分。但在实际交往中，可谓师生两忘。一起谈学术，论人生，评议世道，让人陶醉其间，乐而忘返。玉秋同志为人沉潜内敛，含蓄稳重，好学善思，数年来，启我助我良多，是不得不言、不能不言者。

“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清末民初孔教运动研究》一书可谓范玉秋同志登学术泰山之初步。衷心祝愿范玉秋同志扣紧攀登途中的悬崖峭壁，努力向高处、更高处攀去，以领略人类智慧之无限风光！是为序！

颜炳罡

2006年秋于泉城

目次

引 论	1
一、时代主题的转换与社会思潮的转向	1
二、西方宗教势力的侵入及其影响	4
三、儒学宗教化运动与近代孔教问题	8
第一章 维新背景下的孔教运动及其反响	13
第一节 困境中的解构与重构	
——康有为孔教体系的构建与孔教运动的初兴	13
一、视野的转换与孔教思想的萌蘖	14
二、传统的解构与制度化孔教体系的构建	17
三、民族的危机与“保教”运动的兴起	24
四、康有为化儒学为孔教的目的与意义	29
第二节 发明孔教之真义、挽救孔教之衰亡	
——梁启超、谭嗣同对尊孔保教的呼吁与提倡	33
一、梁启超：承续师说、倡言保教	33
二、谭嗣同：廓清伪学、重振孔教	38
第三节 教不需保、亦不必保	
——西学视野下严复对孔教运动的省察与批判	45
第四节 翼圣经、复名教	
——守旧派对康、梁孔教理论的批驳	55

第二章 革命情势下的孔教问题	62
第一节 海外孔教的传播与康有为对孔教义理的系统诠释	63
一、孔教在海外的传播	63
二、孔教义理的系统诠释	66
第二节 “教无可保”	
——梁启超孔教观念的转变及对孔教运动的反省	78
一、政治立场的改变与思想立场的转移	78
二、对孔教运动的反省与批判	82
三、孔教思想转变的原因及目的	88
第三节 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反对	
——章太炎、刘师培对孔教运动的批判	90
一、章太炎：诋毁孔子、批驳孔教	90
二、刘师培：否定孔教、评判孔学	98
第四节 以科学替代宗教、以反孔推动革命	
——新世纪派等无政府主义者对孔教运动的批判	103
一、以科学替代宗教	104
二、对孔子与孔教的批判	106
第三章 秩序重建与孔教运动	112
第一节 民初社会情势与国教运动	112
一、民初社会状况	112
二、孔教组织的建立	115
三、尊孔读经的呼吁	118
四、立孔教为国教	123
五、国教运动的再度高涨	129
第二节 围绕孔教问题的主要论争	138
一、孔教是不是宗教	138

二、孔教对现实社会之作用	150
三、孔教是否可定为国教	158
四、孔教与帝制复辟之关系	166
第四章 新文化背景下的孔教问题	175
第一节 科学、民主视野下的孔教观照	
——新青年派对孔教的批判	175
一、新青年派反孔的原因	176
二、易白沙与《孔子平议》	178
三、李大钊对孔教的批判	180
四、吴虞对孔教的批判	182
五、陈独秀的孔教观	187
第二节 新人文主义视野下的孔教解读	
——学衡派对孔教问题之意见	198
一、学衡派兴起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特色	199
二、吴宓对孔教问题的理解与评判	202
三、梅光迪的复兴孔教说	204
四、柳诒徵对孔教性质、作用的理解与评判	207
第三节 “非宗教而似宗教”	
——梁漱溟对孔教问题之观点	210
一、孔家非宗教	210
二、孔家似宗教	212
三、孔子之道与世界文化发展之路向	215
四、儒家文化复兴之路	217
第四节 由神道教到人道教	
——康有为对孔教理论的调整和完善	221
一、人道教与神道教的区分	222
二、孔教传承演变的历史考述	226
第五节 策略的调整与转换	
——陈焕章的倡教活动	230

一、创办《经世报》	230
二、提出尊孔议案	233
三、强化孔教会建设	236
四、创办孔教大学	243
结 语	248
参考文献	253
后 记	259

引 论

一、时代主题的转变与社会思潮的转向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清朝中后期,已经明显地呈现出了衰败之象。传统的生产方式,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以经学为统治思想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以及长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对外政策等等,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政治的腐败,文化的专制,经济的萧条,军备的废弛,社会矛盾的激化,无一不在表明这个封建的王朝正陷入停滞、僵化之中,正一步步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侧,经过了产业革命的西方国家却在迅速崛起。随着列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其势力的扩张也逐渐延伸到了世界的东方。

在列强的强大势力面前,清王朝天朝上国的光环和信心被摧毁,弊端尽显。割地、赔款、协定关税、允许传教、开放通商口岸,使中国的领土不再完整,主权遭到严重破坏,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开始丧失其独立自主之地位,中国社会逐渐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1894年,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结果清王朝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战争的失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怯懦、腐败和无能,也进一步刺激了列强的侵略野心。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各列强即纷纷以“租借”的名义强占中国沿海的港口,公然把中国领土划分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开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了空

前严重的程度,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之地,救亡图存成了中国人共同的强烈呼声。

在中国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时期,中国思想界也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列强入侵和社会矛盾激剧尖锐的内忧外患之中,一些关心时势的知识分子因反对汉学(乾嘉之学)的拘泥守常和宋学的蹈空虚妄而对古文经学表示出了强烈不满,在他们看来,古文经学违背了孔子的真意,对现实社会人生无所裨益。这些时代的先觉者要求回到今文经学,力倡经世致用,推扬公羊学说,发明“微言大义”,讥切时弊,倡言改革,今文经学又悄然崛起。清代今文经学的首倡者当推庄存与。庄存与(1719—1788年)字方耕,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其《春秋正辞》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何休的《公羊解诂》印证发挥《公羊传》,阐发其微言大义,开示出公羊家法,可以说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山之作。其弟子刘逢禄、宋翔凤等秉承师传,张扬“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受命改制”等公羊学之精义,直承汉代今文经学之统绪,并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开清代以经言政之风,常州今文经学派也因此标名于世,对晚清今文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继庄存与、刘逢禄之后的龚自珍、魏源更是两位杰出的今文经学大师,他们超出了庄存与、刘逢禄仅用微言大义隐射朝政的限制,直接引用公羊大义讥切时弊,抨击专制,主张“变古”、“更法”,提出了许多惊世骇俗的理论,在当时“万马齐喑”的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在今文经学逐渐兴起的同时,学习西方的热潮也在中国开始出现。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等就提出了“洞悉夷情”、“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口号,开创了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探寻国家出路的努力方向。从19世纪60年代起,以清政府中的一部分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出现,他们以“自强”、“求富”、“育才”为口号,引进西方的机器和技术,开办新型军工和民用企业,创办新式学堂,并成立编译馆,翻译外国科技和政法书籍,洋务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洋务派主要是从实业入手,从“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试图通过船炮、工商、科技

等方面的改革,为中国近代化开辟出成功的道路。洋务运动的开展,使古老传统的中国社会开始出现新的因素,并在酝酿着新的变化。

19世纪70年代前后,早期维新思潮开始在中国社会出现,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陈炽、郑观应、何启等。早期维新派大都曾是洋务运动支持者、参与者。但是,随着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以及洋务运动种种弊端的日益显露,他们同洋务派之间的分歧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在他们看来,洋务派是仅仅看到西方富强之表象,而没有认识到其所以富强之深层之原因,其对西方的学习也是“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是“小变而非大变,貌变而非真变”。和洋务派相比,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已由器物层面提升到了制度层面,主张从政治、经济体制和制度上全面学习西方,“借法以自强”,在中国进行比较全面的变革,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这是早期维新派和洋务派的共识;学习西方,并不等于要以西学来取代中学,变革,是变“器”而不是变“道”,也是早期维新派和洋务派的一致之处(尽管二者“道”、“器”的内涵并不相同)。早期维新派认为,中国在工艺技术、武器装备乃至一些政治、经济制度方面都必须学习西方,进行变革,但是作为封建伦常核心的“圣道”却是不可更改、不能改变。“器可变,道不可变。”(《盛世危言》增订新编范例)“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①“我变者乃富强之术,非孔孟三纲五常之道也。”(《盛世危言·游历》)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上,他们也坚持认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盛世危言·西学》)中学是“体”,西学是“用”,“器”不能掩“道”,“用”不能弃“体”,西学不能超越中学。

但是,如何圆融地会通传统儒学与现代西学,如何使西方之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杞忧生〈易言〉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3页。

“器”与中国之“道”、“西学”与“中学”建构起内在的联系,使“道”成为“器”之“道”、“器”成为“道”之“器”,如何使“中学”之“本”与“西学”之“末”、“中学”之“体”与“西学”之“用”达成统一,明“体”以达“用”、由“用”以显“体”,使“道”与“器”无间、“体”与“用”不二,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都没有能够从理论上作出较为合理的说明。解决这一问题,对中西体用、本末、道器之关系作出恰当的解释,为融通中西,纳近代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于传统文化之中寻求充足的理由,为政治上的维新变革提供更为合理的理论依据,就成了康有为等后期维新派在构建理论体系,解决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流,推动维新变法,寻求挽救民族危亡道路之时所必须面对和必须解决的一项任务。

二、西方宗教势力的侵入及其影响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列强的鸦片和炮舰涌入中国的还有西方的传教士。西方宗教势力的侵入,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文化理念,另一方面也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西方宗教的传入,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基督教(也称基督宗教,含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三大分支及其他一些小派别。本书引用先人所称耶教,即耶稣教的简称,原本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别称。但本书所称耶教指的是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还有东正教)的一个分支聂思脱里派传入中国,被称为“大秦景教”,又称“景教”。景教在中国绵延存在虽然达200年之久,但是由于当时信奉该教的多为胡商、胡人,其流传也仅限于极少数的社会上层和西域商人,并没能得到社会上层的大力支持,所以,景教在中国的传布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唐武宗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下令灭佛,作为外来宗教的景教亦受到牵连,被朝廷明令禁绝。

13世纪中叶,随着蒙古人在中原统治地位的逐渐确立,兼跨欧亚大陆的蒙古政权逐渐形成,基督教在中国的再一次传播历程也逐渐展开。虽然西方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元代史籍中留

下了不少痕迹,在蒙古诸部落和色目人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元代实行民族压迫的四等人制度,在近百年的流传之中,基督教的信徒也主要局限于蒙古人和色目人,而在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汉族人士当中,则极少发现其追随者和信奉者,而后随着元朝统治的崩溃,基督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也再度宣告结束。

明神宗万历十年(公元 1582 年),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儒服传教,基督教开始了它第三次对中国的征程,同时也揭开了西方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的序幕。“利玛窦等之来也,一以传西方之宗教,一以传西方之学术。”^①传教士以西学作为收揽人心之手段,翻译了大量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书籍,在士大夫中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利玛窦对孔教与宗教的关系也作了论述,对孔教的宗教性问题作了明确的界定。他认为孔教只是一种建立在自然法则基础上的哲学而不是宗教,孔子也只是中国最有名的哲学家而不是教主;中国人对孔子的敬仰并不是偶像崇拜,在孔庙中祭祀孔子,本质上也不是宗教崇拜,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对孔子怀有最高的敬意,“以致不敢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稍有异议,而且还以他的名义起的誓,随时准备全部实行,正如对待一个共同的主宰那样。……就是统治者在过去的时代里也给予他以一个人的最高敬意。然而,他却从未像神那样受到宗教式的崇拜。他们感激地承认他们都受益于他遗留下来的学说”。^②由学者和行政官员举行的跪拜、烧香、贡献祭品等祭孔仪式,也只不过是对先师表示致敬,“他们不向孔子祷告,也不请求他降福或希望他帮助。他们崇敬他的那种方式,正如前述的他们尊敬祖先一样”^③,是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表示忠诚而已。孔教之“教”实际上是教化之“教”,而不是宗教之“教”。虽然此后由于罗马教廷传

①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75 页。

② 利玛窦、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2 页。

③ 利玛窦、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04 页。

教政策的改变而导致中国朝廷与罗马教廷之间关系的决裂,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的历程也随着清政府“教禁”政策的宣布而宣告结束。但由此而始,孔教的宗教性问题却渐渐为世人所关注,孔教是不是宗教或者是否具有宗教性成为此后各界人士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鸦片战争以后,在坚船利炮的护卫之下,经历了“教禁”的西方传教士一改明末清初的谦恭卑微之态度,以胜利者的姿态再一次踏入了中华大地。借助所在国家的军事力量,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从沿海口岸到偏僻的内地和遥远的边陲,传教士四处奔走传教,其足迹几乎遍布了整个中国。他们设立教堂,划分教区,广招徒众,使教徒信众的数量不断增加,教会势力俨然成为中国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特殊力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传统儒学的生存境遇也形成了极大的冲击。

首先,随着教会势力的扩大,在“以办学方式推进传教事业”、“以兴办教育传播福音”的信念推动下,各式教会学校在中国大量出现。从1839年11月4日由马礼逊教育协会主办的最早的教会学校(西方教会在中国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在澳门宣布成立起至1875年前后,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总数已达到800余所,学生达30000多人。教会学校以宣教和传播西学为己任,对传统儒学的地位产生了强烈冲击。第一,改变了儒学在教育中的垄断地位,影响了儒学的传播及儒家思想对人们思想信仰的控制。第二,随着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西学、西教中的科学宇宙观和基督教创世说开始对以阴阳、气化、五行、四时、天、道、性、命等为核心的儒家天人之际的宇宙观念提出真正挑战,并进而动摇着以其为基础的传统价值观念。对于这种深层的隐忧,当时的士大夫宋育仁在其《泰西各国采风记》中曾做出明确表述:“其(用心)尤在破中国祖先之言,为以彼教易名教之助,天为无物,地与诸星同为地球,俱有吸力相引,则天尊地卑之说为诬,肇造天地之主可信,乾坤不成,两大阴阳,无分贵贱,日月星不为三光,七曜拟于不伦,上祀诬而无理,六经皆虚言,圣人为妄作。……如彼学所云,则一部《周易》全无是